

部长带队的环保刚性督查值得称道

新华社记者裘立华、高敬

要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光靠部长们带队下去督查是不够的。治理环境,需要像反腐一样严厉、深入和持久,形成长效机制

新华时评

XINHUA SHIPING

日前,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和3位副部长带队,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18个城市开展的2017年第一季度空气质量专项督查正在进行。这一新举措彰显了中央加强环境治理的决心和专项督查的刚性,顺应中央要求,符合人民期待,值得称道。

2013年9月国务院颁布“大气十条”,对实现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指标:到2017年,全国地

级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

“大气十条”实施以来,全国各地空气质量有所提升。但总体来看,我国环保仍处于负重前行、补齐短板的攻坚期,尤其是以雾霾为突出表现的大气污染依然严峻。

短短几天,本次专项督查已发现不少问题:焦作的重污染天气企业应急减排管控标准成了“松紧带”,天津一些企业燃煤锅炉改造进度像“蜗牛”,郑州部分建筑工地黄

土“裸身”无遮盖等等。

针对以往自上而下的督查、督导行动中曾经出现的“上面查得再认真、也怕下边套路深”的情况,公众希望环保部门继续坚持原则、敢于突破,紧紧抓住已经发现的问题线索深挖下去,努力破除一些地方为了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落实中央环保决策部署不力,甚至“阳奉阴违”“瞒天过海”应付督查的“套路”。

本次空气质量专项督查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之外,还应该积极推动各方落实中央环保决策部署,努力宣讲中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力争起到“下去走一路、带动一大片、管用好几年”的效果。督查组更要深入群众中间,广纳民意、汇集民智,征集环境治理的好点子。

诚然,要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光靠部长们带队下去督查是不够的。治理环境,需要像反腐一样严厉、深入和持久,对污染问题也需要“老虎”“苍蝇”一起打,这样才能真正起到震慑作用,形成长效机制。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传承传统文化也要多『把关』

本报评论员李洪磊

在守护、传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时,公众期待各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包括个体,能够真正重视“学术负责人”蕴含的责任与价值,减少类似的乌龙与谬误

近日,西安地铁大雁塔站的一幅壁画,引发了网友热议。在这幅壁画中,公元7世纪时玄奘取经的故事,竟与建于17世纪的秦皇陵同框出现。有网友认为,这幅壁画有损西安历史文化名城形象,但西安地铁随后解释称,壁画这样创作是为了“强调时空观的交错视觉表现”。

面向大众的文化传播媒介,因为“穿越”而引起争论,已非首次。曾有一座城市在设计“李白举杯邀明月”雕塑时,让李白举着比他早两千多年的商代铜爵;古装剧里,主角们也常在历史经纬中游走自如——有些故事设定在汉朝以前的影视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台词时有出现。这些案例都表明,在向大众传播文化知识和优秀传统文化时,有一些机构缺乏对文化的责任感和敬畏感,仍存在重形式、轻内容的问题。

艺术来源于生活,虽然可以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却不能忽略真实的分量,否则很容易闹出乌龙和笑话。要讲清楚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精神追求,第一要务就是秉持严谨认真的责任感,要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证精神,切不可率性而为。

与地铁站“穿越”的壁画相比,春节期间热播的《中国诗词大会》,在专业方面的表现要好很多。除了在现场进行点评和指正的王立群、蒙曼和康震等学者外,《中国诗词大会》背后还有以上海师范大学的李庆广教授作为学术总负责人的学术团队。正是因为有专业力量为节目内容把关,节目质量才有保障,热播才有了坚实的基础。试想,如果这是一档错误频出的节目,它还能收获如潮好评吗?

《中国诗词大会》等综艺节目的成功也启示我们,在向大众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时,专业力量和专业精神应该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多一些“学术负责人”把关,多一点对文化的敬畏感和责任感,才能澄清各种谬误,也才能让优秀传统文化真正与人民生活深度融合,进而助推社会发展。

与专业学者、研究人员相比,普通大众对文化知识尤其优秀传统文化中“误区”的辨别力较低。有时,一些本是错误的说法,却因古装剧的热播而成为大众思维的固定意象。本应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却被断句成“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对此,专业的学者们应责无旁贷地主动发声,提出质疑,以正视听。针对大雁塔站壁画的不妥之处,就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的老师雷鸣率队在网络上提出质疑的。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史雷鸣”能够站出来,承担起正本清源、解决难题的责任。

从网友们关心大雁塔站壁画的“妥与不妥”,我们也能感知到,大众对真实准确的文化知识有着极高关注和渴求。可以说,推进形成人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局面,是有着深厚民意基础的。在守护、传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时,公众期待各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包括个体,能够真正重视“学术负责人”蕴含的责任与价值,减少类似的乌龙与谬误。

用有温度的监管托起小店创业梦

王石川

近日,被誉为“上海滩十碗最好吃馄饨”之一的梦花街馄饨店,在上海市中华路光启南路口换址重开。此前,这家已经开了20年的馄饨店,因为没有营业执照和食品卫生许可证,被相关部门责令关停。去年11月,在上海深化“放管服”改革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曾提及这家小店的遭遇,引发舆论关注。

一家小店的命运,牵动众人的关注,不仅仅因为它是最能代表上海风情的“老味道”之一,也不仅仅因为这家小店承载了店主一家人的生计,更因为如何对待这家小店,检验着执法者的理性与柔情。

犹记得,李克强总理去年11月提及梦花街馄饨和阿大葱油饼时说,小食店可能确实存在证照等问题,“但我们基层政府部门也应更多从百姓角度考虑一下,尽量寻求更多人的共赢。监管也不一定是冷硬的,要多带一点对老百姓的感情。”大道至简,诚挚诺言。呼唤人性化监管,并不意味着拒绝监管,而是倡导有温度的监管,在坚硬的规定与艰辛的生存相冲突时,也可能找到折中的解决渠道。

从媒体报道可知,梦花街馄饨店得以重新开张,得益于一家外卖企业与监管部门积极沟通、承担店面装修费用和房租等。由此便涉及一个属于老生常谈,但不能不提的现实命题:企业责任。挽救像梦花街馄饨店那样的老字号,有多种方式,比如热心市民众筹、责任企业资助等。企业在商言商,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即便有利驱动,终究不是坏事,对这种义举不妨报以掌声。

不过,我们更应该看到,梦花街馄饨店毕竟只是幸运的个体,有太多小店尽管有人气,但没有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卫生许可证,它们如何生存?指望它们都受到企业眷顾显然是奢望,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积极承担责任。在不违规的前提下,帮它们改造,为它们提供可行的生机,并在减税降费上多花一些心思。帮助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店,实际上就是在帮助地方经济自身。小店能活下来,店主一家可确保衣食无忧,往往还能向社会提供几个就业岗位;店铺生意慢慢做大,也能向政府缴纳更多的税费。最重要的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风生水起的今天,小店虽小,但嵌合创业主题,事关民生生计,再小的事也是大事。这样的小店多了,民众更有奔头,社会更有生气,经济更有活力,可谓一举多赢。

着眼于形成最大公约数,才能画出最大的同心圆。只要方向一致,实现目标的路径多元化一些,就会涌现更多暖人心的好事。

从“天价彩礼”到“零礼金”有多远

本报评论员刘晶瑶



4年前,一张“全国彩礼地图”在网络走红,该图以地图形式标注了中国各地的结婚彩礼金额。最近,媒体记者调查发现,4年时间里,这份“彩礼地图”已发生很大变化——很多地方尤其农村地区,彩礼要求已经翻了番。

不过,在舆论热议“天价彩礼”给一些农村家庭带来的巨大压力之时,我却发现这份所谓的“全国彩礼地图”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亮点——某些地区多年来流行“零礼金”;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南方一些经济逐步发展起来的农村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很多地方的彩礼不升反降。

以长江流域的重庆市、武汉市等一些地区为例,当地普遍存在结婚“零礼金”现象:一些女方家长即便索要彩礼,也不会自装腰包,而是返还给女孩,另外还会准备一份与男方彩礼不相上下的嫁妆。

媒体记者基于调查而绘制的新版《全

国彩礼地图”,直观地反映出全国彩礼分布情况的显著特征——“西部高东部低,山村高城郊低”。在河南、山东、贵州、陕西、甘肃等地,更表现出“越是贫困地区,越出现高价彩礼”的特点。从某种程度上说,彩礼地图的高低分布,基本上契合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即彩礼金额的多少与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致呈反比。结婚要不要收彩礼,要收多少彩礼,也与当地男女比例分布情况相关,男女比例相差越悬殊,男多女少的局面越严重,“天价彩礼”之风越恶劣。反之,如果男女比例相差不大,分布均衡,则彩礼现象也鲜有容身之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章总则中的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其中,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就是旨在

维护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天价彩礼”除了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之外,也是对于婚姻法的践踏和无视。针对“天价彩礼”现象的泛滥,人们提出了很多治理之策,包括推动地方政府有作为巧作为,及时伸出有形之手,推动移风易俗工作的开展等。

一位新华社记者在宁夏西海固地区挂职期间发现,因为“天价彩礼”耽误当地居民脱贫致富的例子不在少数。他说了一个案例:64岁的贫困户马永福本来养了11只羊,日子过得还可以,但为了给小儿子结婚凑10多万元彩礼钱,他把羊全卖掉后还借了几万元外债。

而西部某省一位镇农业技术推广站主任是20世纪80年代参加工作的“老农业”,他2015年走访镇上4家担保公司之后发现,4家担保公司2014年共放贷款在8000万元左右,几乎一半是在农历十月后发放。“农历十月后是农闲季节,也是结婚的主要季节,这些钱用在彩礼囤积起来,而当地经济微循环的恶化,更加剧了贫困的代际传递,让有能力摆脱贫困的年轻人陷入了泥沼。

经济越是贫穷,扶不起来的懒汉越多,越会有人动起了“借彩礼敛财”的歪脑筋。相比之下,沿海省份、长江流域乃至经济发达的南方农村和一线城市,人们的生活有奔头、有目标,勤劳致富、创业创新的风气深入人心,女儿出嫁时的所谓“彩礼”更多的是被看成是一种对新人开启婚姻生活的祝福,而不是大赚一笔的工具。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朱启凯认为,“天价彩礼”既有生育观念、价值取向、面子心理等主观原因,也有男女性别失衡、生活成本上升、生活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客观原因,问题的复杂性、顽固性要求各级政府要多从治本上下功夫。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才是治本之策。

只有农村经济条件改善了,养儿防老的理念才能逐步消除,“生男生女都一样”才能成为共识,“天价彩礼”才会失去生存土壤。

严惩“红包贿选”彰显执纪“零容忍”

胡印斌

以零容忍的姿态,将不正当选举行为,遏止在萌芽状态,坚持“露头就打”。唯其如此,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杜绝贿选乱象,让选举不失初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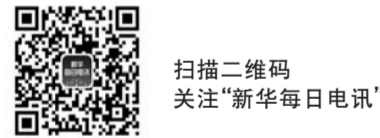
的每一分钱,都有可能打破选举的平衡。哪怕涉案人只花了100块钱,只要破坏了正常的选举程序,妨碍了选举的公开、公平、公正,就应该受到严厉打击。

严惩贿选,于法有据。我国《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

在过去,媒体对黑恶势力干扰村级选举的问题关注较多,但对于一些笼络人情的不正当行为并没有特别重视。但事实上,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的贿选问题已非个别。有些地方每到选举季,候选人都会给

选民送钱、送物,有人甚至专门包下饭店,让选民随时可以免费吃“流水席”。这些做法不仅消解了选举的严肃性,也严重损害了选举秩序,必须高度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大家对100元的贿选红包不容小觑,因为它所承载的信息十分丰富。红包虽小,但它代表了一种新的苗头。有关部门及时遏住苗头,这也符合民政部此前《关于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贿选行为的界定及处置意见》中的定性,即贿选就是“以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收买选民、候选人和选举工作人员,使之违反自己的真实意愿参加选举,或者在选举工作中进行舞弊活动。”贿选固然有金额的大小、钱与物的分别,但无论怎样区分,其性质则是一样的。



扫描二维码
关注“新华每日电讯”



最近,浙江天台县委查处了一起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利用微信红包拉票贿选的案件。村干部候选人戴某在微信群里用100元发了60个红包,为自己竞选村委会主任拉票。事发后,戴某被取消竞选资格,天台县公安局对戴某作出行政拘留7日并处500元罚款的处罚。(据《台州日报》报道)

此事经媒体曝光后,有一些网友很疑惑:用100元发60个红包,平均每个红包还不到1.7元,因此取消候选人资格并处以行政处罚及罚款,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从严肃选举纪律的角度来说,虽然涉案红包的金额不大,但它挑战了选举规则,因此必须严惩不贷。

与一般行贿案件中“一对一”的贿赂行为不同,贿选事关全体选民的公共利益。往大了说,参选者用微信红包发出去